

国企改革小说的新视野

——评楚荷长篇小说《苦楝树》

田文兵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 楚荷的长篇小说《苦楝树》一反先前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叙事模式,以普通工人的视角取代大刀阔斧进行国企改革的领导的视角,透过改革这个宏大叙事题材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情的善良和人性的复杂,以底层工人的温情和苦难揭示了工厂文化这个以往被改革所忽视的精神力量对工人的支柱性作用;它不仅开启了改革小说的新动向,而且展示出作家积极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姿态。

[关键词] 楚荷;《苦楝树》;改革小说;底层体验;工厂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1-0033-04

Analysis of Novels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Reform from New Horizons

——Comment on Long Novel of Melia Azedarach by Chu He

TIAN Wenbing

(School of Art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Chu He's long novel of Melia Azedarach, who against the previous novel narrative modes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taking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workers instead of leadership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reform broadly, shows the good and complicated humanity in society transition period through grand narrative theme of reform; as well as reveals factory culture, whose spirit strength were always ignored by reform, on workers' positive role by the warmth and suffering from bottom life workers. This novel not only opens a new trend for reform novels, but also shows writers' attitude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Chu He; Melia Azedarach; reform novels; experience from bottom life; factory culture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命脉,国有企业的改革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理所当然成为社会的焦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企”这个曾经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事物如今已逐渐淡出人们的关注范围,作家们也不再热衷于创作工业题材的作品,湖南作家楚荷却一直坚持国企改革题材小说的创作,他发表在2005年第2期《当代》上的《苦楝树》就是一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长篇小说。这篇作品不仅在当年《当代》长篇小说评选中荣获银奖,而且成为《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的长篇推荐作品

之一。楚荷的《苦楝树》与其它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有何独特之处,为什么在发表之后引起如此的关注?《苦楝树》的创作给当下文坛带来哪些启示?作者在这篇小说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有着怎样的思考?这些正是我们阅读这篇小说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以底层体验反观改革

对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是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的时代主旋律,自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收稿日期:2012-12-0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症候分析与对策性双重建构”(12YBA145)

作者简介:田文兵(1975-),男,湖北仙桃人,华侨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开新时期“改革文学”之风气,国有企业改革一度成为作家们创作的热点题材,相继出现了诸如《新星》《沉重的翅膀》《大厂》《车间主任》等优秀作品。纵观新时期改革文学,往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情节模式: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者,面对阻挠改革潮流的保守势力,在排除各种不利因素和阻力后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最终使企业生机勃勃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诚然,这类作品塑造的那些披荆斩棘、力挽狂澜的改革者形象,倾注了作家对现代化的热情和期待,也充分体现了作家作为时代代言人和社会预言家的身份。这些小说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新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呼唤和追求,但总会觉得此类“理想型”的创作遮蔽了部分现实,底层的缺席不能不说是这类小说的一种遗憾。1990年代以来,在“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潮流的主导下,《大厂》《分享艰难》《学习微笑》等国企改革小说呈现出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厂长、经理、主任等国企的高层管理者,尽管具有一如既往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但不再是乔光朴式的改革者形象。他们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艰难地在道德和法律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包括2004年《当代》推出曹征路的那篇引起评论界关注和热议的中篇小说《那儿》也不例外,小说中为民请命、敢于担当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劳模出身的工会主席。其次,以往经常被忽视的下岗工人开始被作家们重视,但也通常是选用厂长、书记等高层管理者视角来观照下岗职工的生存处境。

《苦楝树》尽管也是一部关于国有大厂改革的小小说,但这篇小说与以往着力刻画那些胸怀壮志、励精图治的改革者不同,整个故事围绕着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吴满展开。从他进厂拜师学艺开始,到他如何成长为一名技术顶呱呱的电工“满哥”。但是,作为厂里技术权威的“满哥”却在“减员增效”的改革浪潮中“一刀切”下了岗。下岗了的“满哥”被私企高薪聘请成为现代企业中一名“蓝领”,但他还是忘不了曾经一起生活和工作的那一千多号工友和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工厂。如果是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不会仅仅满足于对小说叙事艺术的追求;来自普通国企工人的楚荷也不会满足于讲好国有大厂改革的故事,而是在国企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叙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们的生活。正如楚荷所说的:“我生活在最底层,当然只会用最底层的视角,去写底层人物的爱和恨,写他们的追求,写他们的高尚和卑鄙。”^[1]因此,楚荷在《苦楝树》的写作中,不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来书写国有

企业改革这一重大历史题材,而是从普通工人的视角来表达在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自己作为弱势群体之一员的感同身受。

在《苦楝树》中,处在改革大潮风口浪尖的王厂长,作为改革的执行者他没有响应市里和主管局领导提出的“减员增效”的改革要求,而是另辟蹊径,表面上在厂内张贴各色标语来营造出浓厚的改革氛围,而实际却贯彻着自己当厂长“不减员,要增效,更要保饭碗”的原则。显然作家的目的并不在于怎么去塑造叱咤风云的改革者形象,而是生动而又真实地展示了厂里普通工人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吴满因为满脸的麻子,其他师傅都不愿收他做徒弟,他也因此有幸跟着被打成“坏分子”的电器工程师学电工技术,成为厂里的技术权威。38岁的吴满幸运地与大龄厂花结婚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日子,但没料到厂花遇到歹徒行凶惨遭不幸,抛下了吴满和三岁的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吴芸学习聪明考上重点中学,为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犯愁的吴满却被“减员”下岗。而吴满周围的工人同事也各有难处:带着儿子艰难度日的“梅毒”,白天在厂里工作,晚上去一家槟榔厂打工;厂子破产之后的“瘦妞”夫妇,一没文凭二没技术,做生意又没本钱,只得送蜂窝煤维持生计;学技术不上进的“太岁”两口子,只得开个小麻将馆艰难度日……小说之所以用“苦楝树”为题,就是因为“坏分子”,长相丑陋的吴满,还有他身边的许多同事的经历都有着“苦”字,苦楝树就是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们生存处境的真实写照。

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政治家关注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文学家却必须关注车轮碾过的那一抹鲜红。”^[2]《苦楝树》之所以备受学界关注,当然与其反映这些生活窘迫的“被改革者”在工厂在改革中遇到的种种艰辛和无奈有关。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工厂能够高效率地运行,得到更快的发展,同时也应该使工厂职工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但可惜的是工厂的“减员”不仅没有“增效”,反而导致工厂的最终破产。如果破产就是改革的结果,那么改与不改又有何区别。楚荷创作《苦楝树》不是为了论证和强调改革的迫切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而是以新的角度去关注改革,对改革中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对历史的反思正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苦楝树》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质疑,对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注,既展示了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更体现了文学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参与姿态。《苦楝树》所蕴含的这种

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关注最底层群体生活的精神，必然会引起有责任感的作家重新思考文学之用这个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问题。

二 人性“善”与“美”的展示

作为主旋律的宏大叙事往往会忽视或者刻意遮蔽人性的展示，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小说对人情与人性的书写明显不足。《苦楝树》不同于其他类似题材的作品，作家没有刻意设置改革派与守旧派激烈的矛盾冲突，也没有极力去渲染改革过程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可歌可泣，而是透过改革这个宏大叙事题材来展示社会转型对于人们生活境况的影响，以及在社会巨变中人们的善良和友爱。

在《苦楝树》中，上到厂领导、车间主任，下到班组长、普通职工，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温情。王厂长还是车间主任的时候，在全厂“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用“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挡箭牌使“坏分子”免于挨打；尽管市里和主管局多次提出“减员增效”的改革要求，王厂长体谅到工人下岗后生活的艰难，采取虚张声势或者变通的办法来应付改革。后来厂子破产了，作为厂长他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不可否认王厂长是个“好人”。正因为王厂长的善良，所以命不该绝，在他病入膏肓时吴满为他请来大夫并费心尽力地备齐药方使其康复。小说的主人公吴满尽管面相丑陋，但宅心仁厚，为人正直。他的师傅是被大家公认的“坏分子”，但他没有丝毫的嫌弃，如同对待亲人长辈一样地尊敬和爱戴，在“坏分子”死后他悲痛地为其料理后事；吴满的第一个徒弟意外电死后，他去算命说他命克徒弟，他感到非常自责再也不肯带徒弟，但他还是愿意将自己的电工技术无私地传授给他人；当吴满知道“梅毒”一个人艰难地带着孩子，在上班之余还要打工维持生活时，不习惯说情的他凭借和厂长私交替“梅毒”说情。厂里的同事之间互相谦让，互帮互助，一团和气：瘦妞在吴满妻去世后，主动帮助吴满做家务活照顾吴芸；五车间的叔叔阿姨们为吴芸募捐筹集学费；生老病死电工班的工友都会前去看望并唱歌为其送行等。整篇小说中弥漫着真诚和友善，对人性善的弘扬既是对世间尚存真善美的见证，也是对当下人心浮躁和价值观扭曲现象的批判，这也是为什么楚荷在小说中用更多的篇幅和细节展示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的目的。

当然，小说中也写了一些品行不端的人以及一些为道德所不容的事，例如“公子”陷害满哥、“太岁”嗜赌如命、“梅毒”送礼行贿、还有满哥与瘦妞

之间的偷情等。但作者并没对此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尽量地理解他们，从中发掘其美好的一面，更何况有些坏人也并非真正的坏人，有些不被道德所容的事发生时又是那么的自然而美好。比方小说中的“坏分子”，因为年轻的时候和同厂的一个女孩谈恋爱，忍不住和那个女孩发生了关系，又正好被厂保卫科捉着了，于是就成了“坏分子”。“公子”将满哥的扳手偷偷塞进了刚维修好的电机里使电机烧毁，他之所以用这种恶劣手段来陷害满哥主要是为自己的师傅出口气，因为满哥在李师傅临死之前也没有承认其“哥”的位置，致使李师傅抱憾终生、死不瞑目。用母亲生病和去世为借口骗大伙的钱去打麻将的“太岁”也并不是无可救药，他动员车间的同事们给吴芸募捐筹集学费。“梅毒”为了自己不被下岗，给王厂长、主任送礼不成又色诱满哥，这种种令人不齿的行为背后有其无处诉说的苦衷。满哥与瘦妞之间的“偷情”，也并不是为了追求刺激或者满足欲望，而是被对方的优点所吸引，后来双方都意识到这种行为对不起瘦妞夫，自觉压抑各自的情感约定以兄妹对待，只在心里默默地挂念着对方。小说对这些所谓的“坏人”或者“坏事”的叙述中不乏浓郁的人情味，这可能就是我们被《苦楝树》打动的地方。其实，我们之所以被感动，就是因为人们之间单纯的向善行为和这种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发生和表现出来的淳朴和善良。

在小说《苦楝树》中，楚荷始终没有放弃对底层民众善良而美好的人性的书写，尽管写了底层的艰辛和无奈，但他主要不是批判而是反思，更不是去展示人性的丑恶。同样也是来自底层的楚荷对和他一样的普通工人们有着特别的情怀，所以他写工人就像写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正因为楚荷是带着真诚关怀弱势群体的情怀进行写作，自然就会对工人们多一份理解和热爱。

三 文化视野下的企业精神

在《苦楝树》中有一个全体工人抢修大堤保卫工厂的情节，这是一个颇有趣味、值得深入思考的情节。王厂长响应市里的要求正在策划如何去实施“减员”改革的时候，突发百年一遇的洪水，厂长接到市长的命令，要求带领本厂工人死守厂后的那段堤。大堤被洪水冲开了一个口子，王厂长、满哥，甚至包括平时吊儿郎当的太岁，所有的守堤工人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跳进湘江河。那些留守在厂里的工人，只有15个人因为病或者出差没去，其余的都带着铲子、锄头、簸箕自发地赶来抢修河堤。

因为他们知道抢修大堤就是为了保住工厂,保住一千多号人和几千家属的饭碗。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假设王厂长在洪水来临之前就已经雷厉风行地实施了改革,一部分工人下了岗,那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工人自发地来抢修大堤吗?其实答案很明确,后来王厂长在市里多次施压之下,确确实实地改革了,但“减员”并没有增效,工厂反而一天不如一天,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最终落了个破产的结局。工厂为什么能够保住?有研究者认为:“使小说中的工厂生存下去的,似乎更是一种情感和精神力量,而非仅仅是物质力量”。^[3]工人一旦下岗,这种维持企业生存的精神力量自然会削弱,那么企业就失去了凝聚力。王厂长也并非不知道改革的重要性,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是改革就意味着减员,就要砸掉工人们的饭碗,这让那些视厂如生命的工人们情何以堪?而且当需要用到工人的时候一声令下,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踢开,这种把人当成工具使用的改革也是王厂长无能如何也无法安宁的。因为他知道工厂是工人们从无到有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每一栋厂房和办公楼都留有工人们辛勤劳动的汗水。正因为工人们把厂子当成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工厂受到洪水威胁时他们能自发出来保护工厂的安全;正因为工人们把工厂看成了自己的家,所以工人们即使生活过得比较艰难,但也没有任何怨言。

当然,作家也明白改革势在必行,正如他所说的:“国企改革是必走之路。这条路该如何走才能尽善尽美,绝不是我的智商所能回答的。但我看到的一些国企改革,将原有的企业文化弄得荡然无存,绝不是正确之路。在国企中,员工的确有归属感,即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员工和企业成为一体,甚至与国成为一体。”^[4]尽管楚荷在小说中没有提出如何才能使改革尽善尽美的具体措施,但他触及到了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这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精神财富。对于企业文化尽管存有不同的认识和阐释,但作为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民族文化观念、与社会价值观有很大的联系。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的企业文化不可避免地与企业工人的阶级情感相关,并反映着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阶级地位。工人把自己作为工厂的主人,成为工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企业文化会让工人感到一种身份认同的尊严感。如果我们了解国有大厂文化的基本特征,也就明白了工厂对工人来说就像对家一样的情

感,也更能体会下岗工人那种像甩开沉重包袱一样被抛弃的感觉。就像《苦楝树》中的吴满和刘哥,因为下岗突然使他们失去了主人公意识,就像无家可归的弃儿,其迷惘和苦痛是无法言说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小说的最后,吴满和刘哥虽然安排了比较好的去处,在私企里做技术骨干并有着优厚的待遇,但他们仍有牵挂,怀念着那棵象征着苦难的苦楝树,怀念着那个倒闭了的工厂以及曾经共同工作过的工友们。

虽然楚荷没有给出国企改革的具体建议和措施,但从他的小说中至少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发挥企业文化的正能量,而不是漠视工人的集体智慧,甚至阉割工厂文化。如果把改革比作“洪水”,那么工人们会不会也发扬另一种“抗洪”精神使改革顺利进行下去呢?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而且小说中王厂长有一个改革的措施一直没能实施,那就是针对“前面的路十分艰辛,厂里何去何从”这个题目,发动全厂进行大讨论。假设真的进行了讨论,暂且不管讨论的结果怎样,至少可以集思广益,正所谓“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说不定真会有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减员增效”;而且改革与不改革都关系到全厂的生死存亡,连“太岁”也能跳下湘江河不顾自身安全去保护厂子,凭什么就认为工厂的工人们不会为了厂子的繁荣而敬业工作呢?经济体制的调整仍在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还在继续探索更符合国情的改革方式。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关注工人们的精神层面,激发工人们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发挥企业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工人的集体智慧和力量,这既是一种对工人的莫大的尊重,更是一种对生活在底层人们的深切关怀。

参考文献:

- [1] 楚 荷. 希望工人日子一天天地好[J].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9(5).
- [2] 许志英,丁 帆.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90.
- [3] 邓蕾彬. 当文学再度直面现实——评两部反思国企改革的力作《那儿》和《苦楝树》[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4).
- [4] 楚 荷. 力量不从歌里来[J]. 当代工人,2011(5).

责任编辑:黄声波